

一個藝術天才

關於藏傳佛教第十七世噶瑪巴)

廖亦武

當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20 多萬野戰軍合圍中國首都北京，沿途射殺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製造了讓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天安門大屠殺時，發生在同年 3 月 5 日的西藏拉薩大屠殺卻被淹沒了。因為西方新聞媒體的缺席，喪心病狂的鏡頭沒被記錄下來。聖城拉薩比皇城北京小十幾倍，八角街廣場也比天安門廣場小十幾倍，可是在如此狹隘的空間，竟有一萬多和平示威者和一萬五千多武裝到牙齒的士兵衝突，其結果，300 多平民死於非命，3000 多平民被投入監獄，“罪大惡極者”隨後被判處死刑。位於布達拉宮右側的大昭寺，因為率先升起象徵西藏獨立的“雪山獅子旗”，而被士兵攻佔，寺內至高無上的塔經——它象徵著藏傳密教眾神在世間的尊嚴——被入侵者縱火焚毀。成千上萬的佛教徒為此放聲悲號，不斷有喇嘛撲過去救火，卻不斷被射殺在烈燄之中。

在烈燄中殉道的鏡頭可嘆可泣，這給後繼至今的自焚者開了可嘆可泣的先河。

這一年，也是柏林牆倒塌的這一年，第十七世噶瑪巴才 4 歲，天真無邪。但隨後的 1992 年，按照藏傳佛教“轉世”傳統，經多年輾轉的尋覓，他被寺廟的諸多高僧大德，從茫茫雪山草地間的普通農家辨識出來，並通過達賴喇嘛確認，為十六世噶瑪巴的輪迴法身。作為繼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之後影響力最大的宗教領袖，他入住距離拉薩 60 餘公里的楚佈寺，一座具有 800 多年歷史的聖殿。不知 1989 的殺戮，還有 1959 年那場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國土淪喪更為可怕的殺戮，給一個被天命圈定的稚嫩靈魂，留下了如何的劃痕？

眨眼又過 7 年，噶瑪巴 14 歲了。雖然法相莊嚴，受到全藏老百姓的頂禮膜拜，但畢竟是個純真少年，充滿對彼岸世界的好奇。據記載，達賴喇嘛在相同年紀，喜歡撥弄鋼琴和收音機，思考無線電波刺穿

地球的問題；而討厭政治，也討厭被任何俗世政府管束的噶瑪巴，在誦經功課之餘，卻熱衷於音樂和詩歌。西藏歷史上，有位如雷貫耳的情歌活佛，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為了愛情，竟然捨棄布達拉宮的寶座，他的謠曲至今在雪域迴盪，連我這個漢族流浪漢都學會了——遠去的大雁啊，飛到巴塘就返回吧，你的愛人在原地等你呢——博覽群書的噶瑪巴，當然熟悉這 300 多年前的謠曲，他居然在寺廟內組建樂隊，據傳聞，他喜歡當代搖滾和當代電子樂，是相當出色的詞曲作者，還親自擔任主唱。如果有機會，我將當面拜問尊者，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垮掉一代”有何感受？對詩人金斯伯格和歌手鮑勃·迪倫有何感受？因為後者是我青年時候的偶像，特別是迪倫的《答案在風中飄》——一個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為一個人？炮彈要呼嘯多少次，和平才會降臨——噶瑪巴也許會含笑不語。

可誰能料到，擔負著整個種族命運的至高的噶瑪巴，卻與我，一個不足掛齒的底層文人，有著類似的遭遇——都被多次阻止出境。我曾經遞交了若干申請，並保證避開政治話題，只談文學，有去有回；他也遞交了若干申請，並保證避開政治話題，只談佛法，有去有回；最後，在失去自由的威脅下，我鋌而走險，穿過中越邊境，輾轉來到德國；而他，也在嚴密的監控下，宣布閉關，卻暗中在忠實隨從的掩護下突然出走。

他當時才 14 歲，而我出走時已經 53 歲了。孔夫子說“五十而知天命”，所以我在離開前，用孔夫子親手編纂過的《周易》占卦，得“復”，也就是佛經裏的輪迴之意。而噶瑪巴的輪迴，其意義比我這隻小小螞蟻的輪迴，要深遠得多。他踩著 1959 年達賴喇嘛出走的足跡，顛沛八日八夜，要翻越被稱作世界屋脊的喜馬拉雅山脈！這是怎樣可怕的旅途啊！幾十年來，成千上萬的藏人，為了擺脫奴役，去印度朝覲神聖的達賴喇嘛，或被變幻無常的暴風雪所吞噬，或被共產黨邊防軍的子彈所擊斃，僥倖成功者中，有不少淪為異鄉的殘疾人。可是噶瑪巴，14 歲的不懂政治、只懂佛法的噶瑪巴，竟奇跡般抵達印度達蘭薩拉，風塵僕僕卻完美如玉。達賴喇嘛和噶瑪巴，一老一少，兩代流亡活佛終於在一起了。他們既是尊者，也是用雙腳回應鮑勃·迪倫歌聲的功德圓滿者——一個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為一

個人。

達賴喇嘛說過大意如此的話：共產黨不是我的敵人，而是我的“老師”，因為“老師”的逼迫，我不得不走出西藏。可我不走出西藏，也就像我的若干前世一樣，只是雪域之間比較封閉的活佛，佛法以及西藏的祈願，也不可能像今天一樣傳遍世界。噶瑪巴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他是藝術家，覺得誦經和音樂，比語言更有力量。於是他和眾多西方音樂家合作，灌製了大量的音樂 CD，以驚濤拍岸的當代搖滾節奏，去一遍遍吟誦六字真言。他的音樂和詩歌，在西藏和中國，以地下管道自由地傳播著。我的作家朋友汪建輝，聽了我從成都盜版市場淘回來的《噶瑪巴千諾》，不禁寫了一句詩：誰能阻止一個人內心的微笑？像西藏這樣一個飽經殺戮的種族也會有微笑嗎？他們有仇恨嗎？他們在以牙還牙嗎？沒有。他們在忍受，實在忍無可忍了，他們也不會去傷害別人；實在忍無可忍了，他們也只會傷害自己，前赴後繼地引火燒身。從 2008 年 3 月 14 號，共產黨再次犯下褻瀆神靈、屠殺僧侶的彌天大罪後，他們一次次呼喊“西藏自由”，然後澆透汽油，點燃自己。截止今年 7 月份，已經有 49 位藏人自焚。

世界啊，看看這些被燒焦的軀殼吧——他們的靈魂還會微笑嗎？在噶瑪巴的音樂裏，自焚者的靈魂還會微笑嗎？共產黨能把他們的屠刀舉到天堂嗎？誰又能阻止風兒和落葉、歌唱和寂滅、以及穿越生死的自由輪迴？

大約 8 年前，我從四川成都逃到雲南麗江，在某個漢藏雜居的村落，首次聽到噶瑪巴的《願望之歌》，深受感召。乘著酒興，我抓起在監獄裏學會的洞簫，吹奏了唐代名曲《陽關三疊》。時光之河頓時倒流，陽關之外是漫漫黃沙，絕代高僧唐三藏，騎著識途的老馬，走出箭樓，不遠萬里去印度取回真經。佛教由此傳播，之後又因地域差異而分支為大乘和小乘，漢傳和藏傳——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我的先人這樣吟誦道。而通過轉世輪迴，將先人和今人融為一體的達賴喇嘛和噶瑪巴，體內是否也流淌著唐三藏的血液？我如此浮想聯翩，竟忘記剛剛經歷過家破人亡，忘記暗地裏還有便

衣警察的監視。我祈禱將來有一天，因緣際會，噶瑪巴與我，能如兩個不問來路的遠古旅人，撇開高低貴賤，撇開世相百態，儘興唱和一番。西出陽關無故人嗎？對呀，佛法無邊，西出關山，我們都是既無故人，也無祖國。可不同的是，噶瑪巴有他代代傳承的偉大使命，對於整個藏族，哪裏有達賴喇嘛、班禪和噶瑪巴，哪裏就有故人和祖國。

源於此，當我 3 月份被選定為柏林國際文學節 2012 年的話題主賓，竟心血來潮，向文學節主席烏里先生提出邀請第十七世噶瑪巴。

《邀請信》隨即發出，我們明白這件事的難度。我的朋友廖天琪承擔了開頭的聯絡，隨後，我的朋友郭憶梅承擔了更為繁複的溝通。她倆都是在德國生活了半輩子，卻心繫藏族^人苦難的台灣人，對東西方截然相反的社會形態，也有深刻的洞察。當我們得知噶瑪巴今年沒有出行計劃，卻仍不願放棄，原因是幾個月來，由於共產黨的鐵腕鎮壓，藏人的自焚愈演愈烈。

信心不減的達賴喇嘛已經 77 歲了，依舊為西藏的前途而四處奔波；而噶瑪巴才 27 歲，其救世決心，已經在他新近導演的長達數小時的歷史劇《密勒日巴》裏顯現出來——密勒日巴誕生在 900 多年前，是噶瑪巴同一的噶舉派上師，因為歷經劫難而專攻呼風喚雨之巫術，對仇家實施酷烈的報復，卻沒給自己帶來絲毫的快意。為了從仇恨深淵裏解脫，他另尋密宗上師，通過九層地獄一般的考驗，是雪域西藏家喻戶曉的詩人和哲學家，終於修成正果。

在地緣政治之外，往日的密勒日巴為今天的噶瑪巴，指明了方向。以修煉、弘法和藝術去超越無神論之罪惡獨裁，撫慰人們久治不癒的創痛。可當今亂世，共產黨中國通過壓榨老百姓而經濟騰飛，已經演變成威脅地球生態平衡的怪獸，這隻怪獸的胃口越來越大，不僅要將本土糟蹋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和人性的垃圾場，而且通過明裏和暗裏的交易滲透，企圖將全人類“垃圾化”。不少西方的政治家、企業家甚至人權活動家，礙於西藏宗教和歷史的複雜性，礙於短期的經濟衰退，更礙於共產黨毫不退讓的姿態，不僅漠視西藏的泣血和自焚，而且將此誤讀為與恐怖主義半步之遙的“走極端”。於是，尊者噶瑪巴憂心忡忡地寫下詩篇——

冬季的某日，
我獨處一隅，
然而此時，
卻不知該真正朝向何方，
冷冽中，力竭的人，漫無方向地祈禱著！
故鄉啊！故鄉，你在何處？
或許，是你不願見我這漂泊的人，而消失無蹤！

蒼天啊！
今日聽說，您沒良心的，
給予我的故鄉和同胞們，
前所未有的苦痛……

可誰又會料到，對應噶瑪巴詩篇的，卻是流亡藏人江白益西於 2012 年 3 月 26 日在新德里街頭自焚，
以抗議 1989 年 3 月 5 日拉薩大屠殺的製造者胡錦濤訪問印度。27 歲的江白益西，像一根烈燄騰騰的
火炬，高喊著，狂奔 50 米，轟然傾倒。他在遺囑裏寫道：

尊嚴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尋找正義的勇氣，更是未來幸福的嚮導……自由是所有生命物的幸福所
在，人失去自由，就像風中的酥油燈……我用火點燃珍貴的自己，是向全世界證實六百萬藏人的苦難、
無人權及無公平的處境，如果您有慈悲心，就請關注弱小藏人的
處境……我們要使用傳統宗教、文化和語言的基本自由，要有基本人權，希望全人類能夠支持我們。
藏人才是西藏主人，西藏必勝！

西藏至尊者和自焚平民的聲音，同時讓我們聽見。經過多次努力，心急如焚的我們，終於和噶瑪巴辦公室約定，要萬里迢迢，奔赴達蘭薩拉，於 8 月 3 日上午拜見尊者，恭請他蒞臨柏林文學節，直面幾百位各種膚色各種信仰的被邀嘉賓，為西藏及世界祈福。可始料未及的是，我這初來乍到的流亡者，護照和出境簽證都有問題。

作為德國最高人文領域和平獎的得主，我接受我的朋友郭憶梅的建議，向德國外交部長求援。我提筆寫道：

尊敬的 Westerwelle 先生：

謝謝您的祝賀信。

記得 2010 年 3 月，我第 15 次被阻止出境，十幾個荷槍實彈的機場警察，像抓殺人犯似的，將已經上飛機的我，綁架下來。接著，我被囚禁在家近一個月。而您，一個民主國家的外長，在柏林發表公開的聲援講話，並預言有一天會在德國歡迎我。

我在去年走出了中國，發表了被獨裁當局嚴厲禁止的監獄回憶錄，我用自己的雙腿，實現了您的預言。Westerwelle 先生，請接受一個底層作家的遲到的謝意！在冥冥當中，這意味著什麼呢？接踵而至的，是我獲得了德國圖書貿易和平獎，我又看見了我早已熟悉的您的名字。

您稱我為“紀念文化的勇敢的開路先鋒”，我不敢沾沾自喜，反而覺得有更沉重的東西壓在肩上，因為一個逃出獨裁國度的見證者，當已經站在自由土地上，應該做的，就是為他人擺脫苦難而奮戰。

由此，我要向您緊急求援。

您知道，從去年到今年，西藏人在不間斷地自焚，作為我，一個長期關注西藏，並會見過達賴喇嘛的中國作家，一種憤怒和內疚夾雜的情感，讓我迫不及待想做點什麼。剛巧，柏林文學節委托我擔任今年的主題嘉賓。

我們正在努力爭取讓大寶法王噶瑪巴來柏林文學節，我將在開幕式上，請他為西藏和全人類的和平

與安寧，頌禱《噶瑪巴千諾》。他是繼達賴喇嘛之後，又一位出走的宗教領袖，被公認為達賴喇嘛的繼承者，並且是一位音樂和文學的天才。他的音樂 CD，在西藏、中國和臺灣，流傳甚廣。

我和我的朋友們，帶著柏林文學節的使命，準備秘密前往，恭請噶瑪巴。但是目前，在他出境的問題上，有一些外交上的麻煩。所以我懇請您，尊敬的 Westerwelle 先生，通過您所熟悉的途徑，與印度外交部門溝通，以達成這項絕佳的美事。這對不斷自焚的西藏人，這對世界上唯一的“痛失國土”的種族，該是個多麼大的鼓舞！

西藏這個長期弱勢的族類，會像我和我的朋友們一樣，由此記住以您為首的德國外交部門為他們無比愛戴的噶瑪巴所做的一切。這將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一個 1980 後的宗教領袖，在文學節上，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詩人、作家、藝術家交流——用詩篇和音樂——去撫慰那些自焚的亡魂，並預示一個希望漸漸升起的遠景，讓前赴後繼的自焚者漸漸止步。

正如你在給我的信中所言，無論我過去作為“時代錄音機”的努力，還是今日作為“文學節主題嘉賓”的努力，都是“走向和解之路的一個痛苦但必要的過程”。所以我冒昧地寫信給您，我相信，對於我們恭請噶瑪巴來柏林的這一追求公義的行動，會得到一個文化和歷史記憶上，領先於他國的政府的支持。盼望由您帶來的佳音。

寄出這封信的六天之後，我們應邀在外交部，與十餘位外交官進行會談，然後就是焦慮的等待。我們已經買好去印度的機票，但隨後不得不退票。我打算去印度大使館門前絕食抗議，但隨後又被德國外長辦公室竭力勸阻。我的護照影印此時由他們再次轉遞印度方面。

在我起草這篇演講稿時，郭憶梅和廖天琪，這兩位菩薩心腸的女性，或許正躲在自己家裏，為藏人連綿的不幸而悲泣。我卻說，如果失敗，這是在西方世界，在一個認可自由、平等、博愛的地方的暫時失敗，比獨裁鐵腕下的危及生命的失敗，要輕鬆多了。比達賴喇嘛和噶瑪巴，負載著整個種族的命運，翻越喜馬拉雅山脈，要輕鬆多了。甚至比我去年不得不逃離中國，要輕鬆好些。

況且，當我放下寫作，步行去這條大街盡頭的墓地，平息久久起伏的心潮之際，電話意外地響了。是

外長辦公室.他們說，已經向印度政府表態，支持我們離境，歡迎噶瑪巴入境.

我說，作為來自中國的底層藝人,我的樂器已經準備妥當.

外長辦公室說，請您再等等.

2012年8月3日於柏林